

多模态话语分析视角下视频会议口译员角色研究<sup>\*</sup>

潘梦来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南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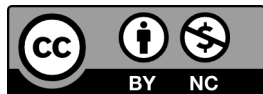
**摘要** | 2019年末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促进了视频会议口译业务的大量增长。口译员作为跨语言文化交际的“桥梁”，在视频会议这一特殊语境下的功能与作用却不得而知。本研究以“角色空间”理论为分析框架，采用多模态分析软件 ELAN，对视频会议口译员角色展开多模态话语分析。研究发现，视频会议口译员角色除具有面对面口译中译员角色的多样性外，还独具空间维度上的复合性。此外，视频会议口译员“角色空间”的构建路径具有多模态特性。基于此，有必要加强视频会议口译客户教育，并加强培养译员的话轮管理能力与多交际模态交际能力。

**关键词** | 多模态话语分析；视频会议；口译；译员角色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 一、引言

2019年末，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对国际经济社会带来较大冲击之时，也刺激远程会议、视频会议等新业态的新发展。视频会议行业的进步带动视频会议口译业务量提升。在这一背景下，视频口译研究引起国内外口译学者广泛关注（如 Skinner et al., 2018；王斌华，2020；张爱玲、丁宁，2021）。译员作为视频口译活动的核心，其交际管理、行为与表现等均对口译成功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是学者关注的重点主题之一。

本文关注视频会议口译中的译员角色问题，将采用“角色空间”理论，运用多模态话语分析法，研究视频会议口译中译员“角色空间”的多模态构建路径，并总结译员角色特点，以期拓展译员角色

研究思路，并以小见大，对技术与口译这一宏大的时代命题做出一些思考。

## 二、文献综述

视频会议口译（videoconference interpreting，简称 VCI）是视频口译（VMI）的一种形式。是指“参会方位于不同参会地点，译员与其中一个或多个参会方共处一个地点的口译形式”（Braun and Taylor, 2012）。与传统现场口译相比，视频会议口译有效降低了人力和物力成本（姚斌，2011），但同时高度依赖技术设备，可能使译

<sup>\*</sup>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院级课题（GSB2020012）阶段性研究成果。

员面临非语言信息的缺失,或是无法获得完整的交际信息(蒋莉华、李颖,2020)。此外,一些技术问题,如连接中断,声音和画面质量不稳定等易导致话语被迫打断,话语重叠等交际问题,对译员交际管理构成新挑战(Licoppe et al., 2018)。

对此,学者们十分关注视频口译的交际过程与译员角色问题。目前,这方面研究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并以西方学者为主。理论贡献方面,Llewellyn-Jones 和 Lee (2014)运用自建的“角色空间”(role-space model)理论,比较了法庭上远程口译员与现场口译员“角色空间”的差异,洞悉了远程口译中视觉信号缺失给交际带来的消极影响(胡娟,2016)。受此启发,Devaux (2017)将“角色空间”理论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结合开展实证研究,调查了法庭视频口译员对自身角色的看法,并探讨了该看法与技术使用的关系。作者发现译员对自身角色看法虽具有多样性,但本质上译员还是在行动者网络中扮演信息“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角色。此外,作者还发现,视频媒介对译员的交际管理程度产生影响。部分译员认为视频阻碍了其在线上参会者的交际,使其难以与后者产生默契,而另一些译员则认为其交际不受视频媒介的影响。

第二,研究集中于社区场景。全球化时代,西方国家不断增长的移民人数与高质量译员供不应求间的矛盾导致社区口译的工作方式不断向技术靠拢(Skinner et al., 2018)。然而,在视频会议口译领域,尽管相关实践体量不小,但对译员在视频交际过程中扮演角色的研究数量目前仍偏低(Napier et al., 2018),人们尚不明确视频技术对交际效果产生什么影响及如何影响。

第三,实证研究缺乏。前人研究以问卷法或访谈法等人文主义方法为主,探索译员对自身角色的主观看法(如 Mellinger and Hanson, 2018)。实证研究法,如语料库法,虽例证充分,结论更具科学性(邢星,2015),但相关研究仍不多见,不利于为译员角色提供更多客观数据的支撑。对此,Pochhacker (2020)提出将多模态语篇分析法运用于视频口译研究中,并认为这将促进技术在口译实践中的应用。“模态”是指人类通过感官跟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方式(顾曰国,2007;

3),包括但不限于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对口译交际过程进行多模态语篇分析,就是关注各种模态阐释文本和交际意义的复杂过程(Norris, 2008: 129)。近年来,国外研究者(如 Lioppe and Veyrier, 2020)注意到眼神(gaze)在视频口译过程中发挥的话轮转换标记作用。Vranjes 和 Brone (2020)进一步提出有必要在视频口译过程中使用可穿戴式眼动设备研究眼神在听者反馈和话轮转换中的作用,以明确译员和主要交际者在交际过程中依赖的符号或多模态资源。可见,学者们已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口译交际过程是多模态相互协作表达意义的过程,只有运用多模态话语分析法才能更全面地获取译员用于意义表征与交际的各种符号,深入分析译员角色。

上述研究表明,视频媒介在口译活动中的运用促使译员交际管理行为发生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译员的新角色。但研究在数量方面,体量偏小,且以西方学者为主。在研究质量方面,研究场景和涉及语对比较单一,研究方法也未能充分挖掘非言语模态对译员角色的塑造作用,对研究结论的信度和效度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拓展了研究场景和互译语对,并尝试结合译员角色研究的新理论,采用多模态话语分析法对视频会议口译员角色展开实证研究,以期弥补上述不足。

### 三、理论框架

本文运用“角色空间”理论展开研究。该理论是英国利兹大学 Peter Llewellyn-Jones 和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 Robert G. Lee 基于多年手语传译和口译研究经验联合推出的用于研究社区口译员角色的新理论(胡娟,2016),被国内外学者,如 Mikkelsen (2015)、胡娟(2016)认为是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研究理论,“将对所有类型口译员角色的研究都具有启示意义”(Mikkelsen, 2015)。

“角色空间”理论认为,在传统译员角色研究中,学者们惯于为译员角色贴上静态标贴,如“中介”“居间者”等,既无法说明不同标贴角色间差异,也不利于构建译员职业身份(Devaux, 2018)。相反,译员角色应是“流动的”。译员在不同时刻,或不同主要说话人面前扮演不同角色,且不同角色处于一个连续统上。

“角色空间”是由 X 轴、Y 轴和 Z 轴共同构成的三维空间(图 1)。三个维度确定和限定了译

员做出决定并采取策略确保交际取得成功的区域 (Llewellyn-Jones and Lee, 2013)。其中, X 轴为“参与者同盟关系”轴, 指译员向现场或视频参会者靠近, 或保持中立的程度。箭头越往左(或右), 则译员与线下(或线上)参会者的同盟关系越紧密。Y 轴为“交际管理”轴, 指译员对交际事件的调节方式与程度。箭头越向上延伸, 译员交际管理程度越高, 反之则越低。Z 轴为译员“自我呈现”轴, 指译员在口译过程中暴露自我信息的程度。箭头越往右上角延伸, 译员自我呈现程度越高, 反之则越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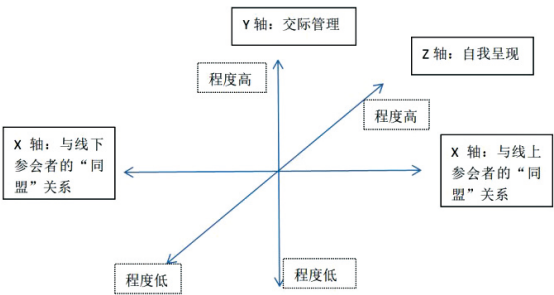


图 1 Llewellyn-Jones 和 Lee 的“角色空间”模型 (笔者译, 略有改动<sup>[1]</sup>)

为提升理论的可操作性, Llewellyn-Jones 和 Lee (2014) 提出了一份“‘角色空间’判断原则清单”(样单), 对译员可能出现的各种行为与三条轴线进行一一对应(表 1)。

表 1 “角色空间”判断原则清单 (Llewellyn-Jones, 2014, 笔者译)

	自我呈现(Z轴)	交际管理(Y轴)	参与者同盟(X轴)
译员行为	自我介绍或宣誓	要求重复或澄清	直接与参与者对话
	自称“翻译/译员”	掌控话轮	提供反馈和反馈渠道
	言语间体现个人喜恶	要求采取某行动	解释口译流程的某方面
	直接回答问题	要求改善环境	因参与者幽默发笑
	自曝个人信息		接收肢体语言或眼神接触

Lee 和 Llewellyn-Jones (2014) 指出, 若译员出现越多“判断原则清单”中的行为, 则相应轴线上的点越向“程度高”一端位移。例如, 译员在口译过程中既掌控话轮, 又要求重复或澄清, 则 Y 轴, 即“交际管理”轴上的对应点向“程度高”一端位

移, 说明译员交际管理程度比较高。最终, 三条轴线上的对应点连接起来, 构成“角色空间”模型。

值得注意的是, Lee 和 Llewellyn-Jones (2013, 2014) 在大部分情况下关注言语交际模态, 将其作为译员构建“角色空间”的主要判断原则, 只在少数情况下关注语言外交际模态, 如“发笑”“肢体语言和眼神接触”。然而, 语言与非语言符号对促进交际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Goodwin, 1981)。因此, 本文尝试更多关注非语言模态如何与语言模态共同塑造译员“角色空间”。

四、研究设计

(一) 研究问题

本研究将回答以下四个问题: (1) 译员在视频会议口译过程中采取了哪些交际模态? (2) 这些交际模态如何构建译员“角色空间”? (3) 该“角色空间”具有什么特点? (4) 对未来视频会议口译实践有何启示意义?

(二)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的分析数据源自 CGTN“全球疫情会诊室”视频会议录像<sup>[2]</sup>, 共有三段录像, 共 247 分钟(见表 2)。会议主题均为“传统中医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经验分享”, 共有来自中国与世界各地奋战在疫情一线的中医专家、学者、临床医师 28 人参加会议, 其中, 中国专家和世界其他国家地区专家各 14 名, 还有百万名网友通过 CGTN 网络平台收看直播(央视网, 2020-04-12)。两组译员, 共四人与中方参会者共处同一会议室, 为本次会议提供交替传译服务(图 2、图 3 箭头所指为译员)。本次录像的镜头也设置于该会议室。

[1] Llewellyn-Jones 和 Lee 的原图中, 左半段 X 轴原指“译员与法庭中交际参与者的同盟关系”, 右半段 X 轴原指“译员与被告或目击证人的同盟关系”。笔者出于研究目的, 参考 Devaux (2017) 的做法, 将 X 轴左半段定义为“译员与线下参会者的同盟关系”, X 轴右半段定义为“译员与线上参会者的同盟关系”。

[2] 视频网址: <https://www.cgtn.com/search?keyword=Live:%20China%27s%20National%20Health%20Commission%20holds%20press%20conference%20on%20coronavirus%20control>.

表2 语料详情

录像编号	内容	时长	获取时间
录像1	中国中医专家与海外同行分享中医预防新冠肺炎疫情经验	71 分钟	2020-03-26
录像2	中国中医专家与海外同行分享中医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经验	94 分钟	2020-03-29
录像3	中医如何帮助一线医生战胜新冠肺炎疫情	82 分钟	2020-04-02



图2 视频会议现场截图(录像1)



图3 视频会议现场截图(录像3)

本文将采取多模态话语分析法。我们根据视频画面观察结果,借助多模态分析软件 ELAN (Eudico Linguistic Annotator)<sup>[1]</sup>,从“口头语言”“注视”“身体姿势”和“手势”等四个模态对视频语料进行转写与标注。首先,将单个录像(mp4 格式)导入软件中。其次,添加“口头语言(译员)”“注视与身体姿势(译员)”“手势(主持人)”“口头语言(主持人)”“口头语言(线下参会者)”“口头语言(线上参会者)”“注视与身体姿态(线上参会者)”“注视与身体姿态(线下参会者)”等八个标签,每个标签为一个标注层次。第三,借用 Bao-Rozee (2016) 的多模态文本标注方案,对发生于同一时间点的交际模态进行分层、分人标注。最后,结合“角色空间”理论的三个维度及各维度的判定原则对转写和标注结果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

具体标注标准如下。进行主要参与者与译员标注时,“I”表译员,“OFF”表线下参会者,“ON”

表线上参会者,“M”表会议主持人。进行交际模态标注时,“口头语言”模态以“话轮”为标注单位,以便为译员“角色空间”分析提供量化参考。

“话轮”是“在会话过程中,说话者在任意时间内连续说出的具有和发挥了某种交际功能的一番话,其结尾以说话者和听话者的角色互换或各方的沉默等放弃话轮信号为标志”,分为“话轮”与“半话轮”两类,其中“半话轮”又分为“未完成话轮”与“附属话轮”(刘虹,1992)。笔者进行标注时,尤其注意话轮重叠时对话轮的统计。话轮重叠时,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只当一个话轮计算。第一,两人同时讲话时,一方马上主动退出。第二,当一个话轮发出时,另一个话轮正在进行,并将该话轮融入进本话轮中。此外,听者的反馈不计入话轮。

“注视”模态以符号进行标注,“@@→”表对某人的持续注视,“@→”表对某人的短暂注视,“@@”表双方眼神接触。“身体姿势”模态以“body shift (移动身体)”进行标注。“手势”模态以“preparation (起势)”“stroke (划出)”“retraction (收回)”进行三段式标注(Norris, 2004: 29)。

经笔者人工统计,三段录像共有 437 个话轮,其中,主持人话轮 103 个,译员话轮 143 个,线下参会者话轮 103 个,线上参会者话轮 88 个。译员使用“注视”交际模态 80 次,“注视”与“身体姿势”复合交际模态八次,主持人使用“手势”交际模态 18 次。

## 五、数据分析

通过对视频数据的观察与分析发现,多模态对促进视频会议口译交际具有重要意义。译员作为视频会议中跨越不同语言文化的“桥梁”,为避免视频媒介带来的潜在交际障碍,综合调动“口头语言”“注视”“身体姿势”等三种模态进行交际管理,或与参会者结成暂时同盟关系。此外,会议主持人也使用“口头语言”和“手势”模态调控话轮,导

[1] ELAN 是马普心理语言研究所(荷兰)开发的多模态话语分析软件,能对视频文件进行多层次同步标注,具有定位精准、多模态标注同步进行、标注编码可自定义、标注间便于纵横对比、标注结果输出格式多样化等优势(王立非、文艳,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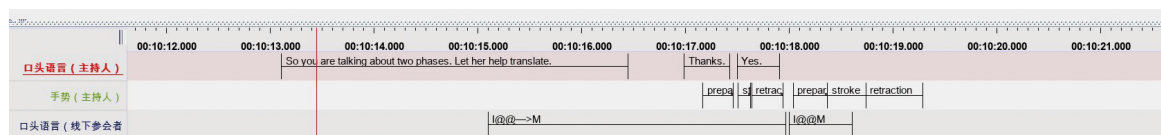
致译员在会场中的“可见性”程度提升。总体上看,译员与主持人使用多模态在“自我呈现”(Z轴)、“交际管理”(Y轴)、“参与者同盟”(X轴)三个维度上构建译员角色空间。下面就各维度的多模态构成逐一展开分析。

### (一) “自我呈现”

“自我呈现”是译员在口译过程中暴露自信信息的程度(Llewellyn-Jones and Lee, 2014),判断原则以机构规定的译员行为或译员主观行为为主,如“自我介绍”“自曝个人信息”“自称译员”等(Llewellyn-Jones and Lee, 2014)。然而,视频会议主持人的主持活动可能改变译员“自我呈现”的方式。主持人作为会议流程的把控者,对话轮有公

认的控制权。当他通过使用“口头语言”“口头语言+手势”交际模态行使控制权进行话轮调节时,客观上造成译员被动“呈现”。

具体来看,会议主持人在17.5%(18/103)的话轮自然结束后使用“口头语言”和“手势”模态提示译员开始翻译,以明示话轮转交至译员。此外,主持人还在源语过长时,在10.7%(11/103)的话轮中通过“口头语言”模态打断发言人并强行将话语权转交给译员。我们认为,会议主持人的举动一方面有利于把控会议进程,但另一方面易打断所有与会者(包括在线网友)注意力,提升译员在与与会者面前的“可见性”,从而造成译员“自我呈现”程度比较高。



例1 (录像3, 2020-04-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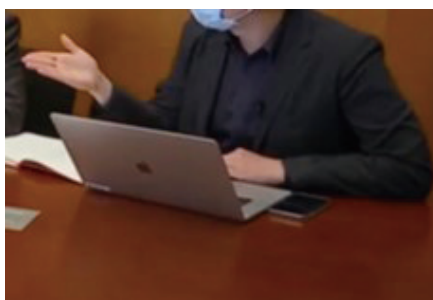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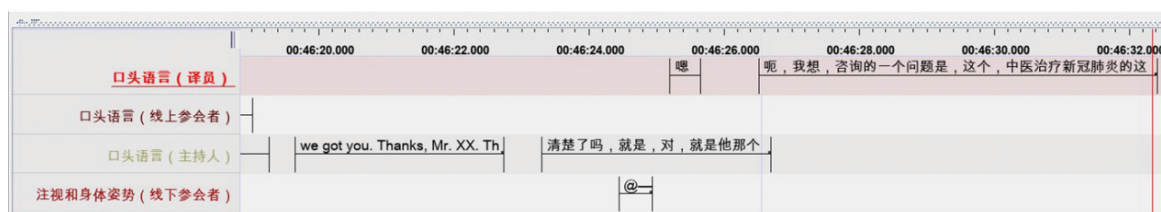


图4

例1中,主持人在线上发言人发言完毕后,先总结其发言内容(“So you are talking about two phases.”),再用言语告知对方,需要译员进行翻译(“Let her help translate.”)。随后,主持人使

用指示型手势,摊开手掌指向译员方向(见图4),同时运用“口头语言”(“yes.”)示意其开始翻译。主持人叠加“手势”与“口头语言”模态,通过“视觉”与“声音”两个渠道提醒参会者话语权转移,一方面有利于表明交际意图,另一方面通过多模态叠加传递“需要翻译”的交际信号,引导听众注意力向译员转移,可能在无形中强化译员“可见性”。

此外,当源语发布内容过于冗余,或发布时间过长时,主持人直接采用“口头语言”交际模态打断源语语流,以提醒源语发言人需要将时间留给译员(如“稍等一下,给翻译一下”或“Could you please pause for the interpreter?”)。该行为强制话语权发生转移,也使发言人和其他参会者的注意力向译员转移。



例2 (录像3, 2020-04-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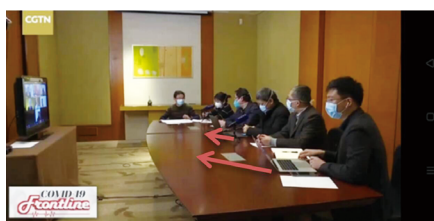


图 5

例 2 中, 线上意大利中医专家对线下中国中医专家提问, 以不同表达形式重复发问(“中医如何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开展‘辨证施治’”)。主持人见状, 遂运用“口头语言”模态打断源语发言(“We got you.”), 并给予译员提示(“明白了吗? 就是那个……‘辨证施治’”), 同时眼神看向译员, 示意译员接替话轮。同时, 画面中可见, 在主持人口头提示译员时, 线下参会者也扭头看向译员, 说

明其注意力转移至译员(见图 5)。

## (二) “交际管理”

“交际管理”是译员对交际事件的调节方式与程度, 使用频次越高, 则译员在口译场域中的可见性越高, 判断原则包括“要求重复或澄清”“掌控话轮”等(Llewellyn-Jones and Lee, 2014)。具体来看, 译员在 7% (10/143) 话轮中使用“注视”和“身体姿势”模态要求线下发言人重复, 仅在 0.7% (1/143) 的话轮中使用“注视”“身体姿势”和“口头语言”模态要求线上参会者重复。因此, 译员对二者开展“交际管理”的程度均为很低, 后者又比前者更低。

经观察, 若源语发布者是线下中方参会者, 则译员在对中医药相关术语和概念的记忆或理解出现障碍时, 运用“注视”和/或“身体姿势”模态要求重复或澄清。

	00:21:54.000	00:21:56.000	00:21:58.000	00:22:00.000	00:22:02.000	00:22:04.000	00:22:06.000	00:22:08.000	00:22:10.000	00:22:12.000
口头语言 (译员)	... powder, or Yupingfeng San,		e				er... several herbs of		Hu	白术
注视和身体姿势 (译员)			I@@→OFF, body shift		I@@→			I@@→OF		
口头语言 (线下参会者)			防		黄			黄芪		白术
注视与身体姿势 (线下参会者)			OFF@→I					OFF@→		

例 3 (录像 1, 2020-03-26)



图 6

线下中方中医药专家在回答问题时, 提到“玉屏风散”“防风”“黄芪”“白术”等中医专业术语。译员在译出第一个术语“玉屏风散”(Yupingfeng

San) 后, 却忘记后面术语, 遂中断翻译 7 秒左右 (00:21:58.000-00:22:06), 并通过“注视”和“身体姿势”交际模态, 看向中方发言人, 同时身体向对方倾斜(见图 6), 示意对方重复源语。我们认为, 这一做法可能表明译员希望在尽量不引起其他参会者注意的前提下获得中医术语提示, 以顺利完成口译, 但中断译语以求重复源语的交际管理方式仍有失妥当。

若源语发布者是线上参会者, 则当译员对一般信息的理解出现障碍时, 运用“口头语言”“注视”和“身体姿势”模态要求重复。

	00:51:26.000	00:51:28.000	00:51:30.000	00:51:32.000	00:51:34.000	00:51:36.000	00:51:38.000	00:51:40.000
口头语言 (译员)	面, 可以, 呃, 怎么去使用, 这个比较大		第二		Mr. XX, can you repeat your sec			
注视和身体姿势 (译员)			I@@		I@@→ON, body lean forward			

例 4 (录像 1, 2020-03-26)



图 7

例 4 中，线上参会者首先向线下中方专家提出两个问题，译员在第一个问题翻译完成后，遗忘第二个问题的源语。为明确该问题的内容，译员同时使用“口头语言”“注视”和“身体姿势”三种交际模态，在提出问题（“Can you repeat your second question?”），紧盯视频屏幕，上身前倾，请求视频参会者重复第二个问题。

译员此举，无论是否有意，均有助于提升交际效果。从录像画面可见，当中方专家发言时，镜头对其聚焦，当译员翻译时，镜头没有对其聚焦，而对所有参会者进行整体拍摄。这意味着线上参会者在视频画面中始终只能见到正在发言的中方专家，或在现场的所有参会者，包括主持人和译员，因此，只能靠音频和视频画面猜测和辨别谁是译员（会议开始时也没有译员介绍）。在这一前提下，译员使用“注视”模态能提示线上参会者注意力方向（Lang, 1978; Mason,

2012），而“身体姿势”模态表示译员为听清线上参会者所言而向对方“靠近”的意图，二者结合能更好地帮助线上参会者聚焦提问者，提升交际效果。

（三）“参与者同盟”

“参与者同盟”是指译员向线下或线上参会者“靠近”，或保持中立，可通过“直接对话”“眼神接触”等原则进行判断（Llewellyn-Jones and Lee, 2014）。“注视”展示说话人注意力方向（Lang, 1978; Mason, 2012），是体现译员与参会者同盟关系最简单的方式（Llewellyn-Jones and Lee, 2013）。正常情况下，说话人总在说话时不时看向受话人（Goodwin, 1981: 75），以确保听者注意力集中，同时表示“鼓励”受话者参与交际（Bao, 2016: 152）。对译员而言，其在输出译语的过程中看向听众，意味着关注听众，并“鼓励”对方积极对译语做出回应，显示译员与听众的“同盟”关系。

总体来看，译员在输出译语时多次使用“注视”模态，但注视线下参会者的频次（49 次）显著高于注视线上参会者的频次（31 次，卡方检验  $P$  值  $=0.04, < 0.05$ ），说明译员与线下参会者的“同盟关系”更加紧密，而与线上参会者的“同盟关系”较为疏远。

当受话者是线下参会者时，译员在话轮中间看向参会者 21 次，其中，看向线下参会者 18 次，占译员注视总频次的 22.5%（18/80）。

00:24:34.000	00:24:36.000	00:24:38.000	00:24:40.000	00:24:42.000	00:24:44.000	00:24:46.000	00:24:48.000
口头语言 (译员)		地区现在正在开展的一些临床	证明了中医药比西医有更好的治疗效	所以当前我们正	能用到的，这个，中成药，利	来，来治疗新	
注视与身体姿势 (译员)			@→			@→	

例 5 （录像 3，2020-04-02）



图 8 （00:24:38）



图 9 （00:24:46）

线上的意大利中医专家首先介绍了本国使用中医治疗新冠肺炎的情况，译员随后为线下参会者翻译这段发言，时长共计 33 秒（00:24:15-00:24:48）。译员在翻译结束前的十秒内先后两次抬头（见图 8 和图 9）望向线下参会者和主持人方

向，以确保听众注意力集中，同时“鼓励”线下参会者参与交际。

当受话者是线上参会者时，则译员在话轮中间看向线上参会者 11 次，占译员注视总频次的 13.75%（11/80）。



口头语言 (译员)	2:26.000	00:52:28.000	00:52:30.000	00:52:32.000	00:52:34.000	00:52:36.000	00:52:38.000
注视与身体姿势 (译员)				I@→ON		I@→ON	
		We can choose to apply the targeted TCM			to help us combat COVID nin		

例 6 (录像 2, 2020-03-28)

中方中医专家分享了对中医针灸疗法抗疫效果的看法,随后,译员为线上参会者翻译这段话。整个翻译过程共计 1 分 12 秒 (00:51:22-00:52:32)。译员

在翻译即将结束时,两次抬头看向线上参会者(见图 10 和图 11,视频屏幕在本截图画面外——笔者注),以检查受话者注意力,并示意对方继续参与对话。



图 10 (00:52:31)



图 11 (00:52:34)

然而,译员还在三个话轮中通过“注视”将线上参会者“排除”在外。这可能会对后者参与

交际的主观能动性产生影响 (Mason, 2012),不利于二者建立同盟关系。

口头语言 (译员)	00:27:38.000	00:27:40.000	00:27:42.000	00:27:44.000	00:27:46.000	00:27:48.000	00:27:50.000	00:27:52.000
注视与身体姿势 (译员)							I@@→OFF	
	an	they are very es	so, my suggestion is,	coul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elp to	exportation of this kin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dru...	drugs		

例 7 (录像 3, 2020-04-02)

例 7 中,有两位线上参会者是海外华人中医。为方便与线下参会者交流,他们在发言时使用中文,译员则需译入英文,以便汉语非母语的线上参会者和在线网友收听。按照一般交际习惯,译员应在翻译时看向交际对象,即屏幕中的线上参会者。但在事实上,译员在三个相应的翻译话轮中没有看

向屏幕,反而两次看向线下参会者(见图 12 和图 13)。这一做法违背了一般交际中的“注视”模式,不利于译员及时观察线上参会者的反应或“锁定”其注意力。更重要的是,此举可能体现出译员将线上参会者“排除”在外的潜意识,削弱译员与其“同盟”关系,同时增强与线下参会者的“同盟”关系。



图 12 (00:27:38)



图 13 (00:27:50)



经上文分析可知,视频会议主持人和视频口译员共同在“自我呈现”“交际管理”“参与者同盟”三个维度上创建了面向线上和线下参会者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空间”<sup>[1]</sup>(见图14、图15)。其中,译员“自我呈现”程度比较高,但“交际管理”和“同盟关系”程度因参会者地理位置不同而不同。译员对线下参会者的交际管理程度低,但同盟关系较紧密,对线上参会者的交际管理程度很低,同盟关系也比较疏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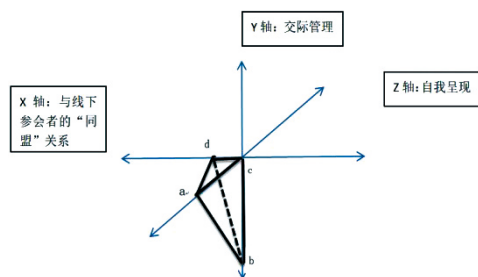


图14 译员“角色空间”(与线下参会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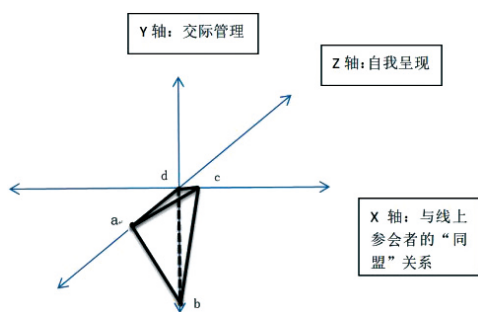


图15 译员“角色空间”(与线上参会者)

## 六、讨论

### (一) 视频会议口译员角色的复合性

尽管对所有参与视频交际活动的交际者而言,译员是所有信息的“强制通行点”(Devaux, 2017),但对处于不同物理空间的参会者而言,译员角色仍有细微差别。本研究发现,对线上参会者而言,译员交际管理程度很低,且同盟关系松散,因此译员角色偏向信息转化与传递者。而对线下参会者而言,译员交际管理程度低,但同盟关系紧密,因此,译员不仅是信息转化与传递者,更是潜意识里的同盟者。两个角色分属两个不同的“角色空间”,但同时在译员身上共现,说视

频会议口译员角色具有空间维度上的复合性。

由前人研究可知,在传统线下会议中,译员角色具有多元性,如机构知情者(Sun, 2011),或具备本体意识的调控者(詹成, 2011)。但正如Mason(2009)所指出的一样,多元性强调译员各角色间的差异性,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认为译员扮演的多个角色无法共存。本文将译员角色研究置于视频会议这一特殊的空间场域中,发现译员角色不但具有多元性,还在空间维度上具有复合性。这一发现体现了口译活动要素变化对译员角色与译员能力的影响。Pochhacker(2019)指出,当前,远程口译技术的使用打破了口译交际者所处的空间障碍,延展了口译活动的发生范围,创造出多个共存的口译活动空间,而译员在每个空间中都有相对应的角色。因此,可以说远程口译技术的使用加剧译员角色复杂性,体现出技术使用对人类交际活动的影响,对今后译员素质与能力培养提出更高要求。

### (二) 多模态构建下的译员“角色空间”

本研究采取多模态话语分析法对译员角色进行分析,强调了非言语交际模态,如注视和身体姿势对译员角色的塑造作用。这一发现与Bao-Rozee(2016)的研究发现相似。她对不同面对面交际场景下口译员使用的言语、手势、注视和肢体语言进行多模态话语分析,发现译员为实现不同交际目的而采取不同交际模态。本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除交际目的外,与主要参会者的时空(主要是空间)差异也可能是译员采取多模态方式交际的原因之一。本案例中,大部分译员表现出对多种交际模态的无意识调用,除言语模态外,还分别采用身体姿势模态对线上和线下交际者进行交际管理(见例3、4),以及注视模态展现与线上和线下参会者亲疏不同的同盟关系(见例5、6、7)。可见,在视频会议口译场域中,译员角色的构建是一项综合性“工程”,以言语交际模态为主,但非言语交际模态的贡献也不容忽视。这一发现是对译员“角色空间”理论的有

[1] 笔者以立体几何图形的绘制方法展现三维“角色空间”。图14中的ad、bd、cd线和图15中的ac、bc、cd线均为辅助线。

益补充,将为我们更全面地考察译员空间的构建之路提供更多视角。

### (三) 对未来视频会议口译实践与教学的建议

#### 1. 加强用户教育

当前,视频会议正处于飞速普及阶段,国内视频口译实践与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开展视频会议口译用户的教育有利于提升他们对视频口译质量的满意度,保证对视频会议口译员角色合理认知。口译领域中的“用户教育”概念首次由Bühler (1986)明确提出,是指以口译用户为教育对象,围绕口译活动及口译服务相关事宜进行的提示指导、解释说明和商榷沟通(范志嘉,2018)。鉴于已有的口译用户教育主要针对线下口译形式,参考价值有限,我们拟提出在译前、译中和译后三个阶段对视频会议口译用户展开教育。

第一,译前与参会者和主持人就视频会议过程中的交际管理方式进行积极协商。译员应在会议正式开始前告知客户时空、技术限制可能对视频会议产生的潜在影响;与用户协商发言方式和长度,知会对方,译员会在必要时刻进行交际管理,包括适当打断发言,要求重复或澄清,告知话轮重叠等;与客户就交际管理的信号或手势达成一致。若有会议主持人的,还应与其充分沟通,确保各司其职,保证有效的话轮衔接与转换。

第二,视频会议进行时,译员应在口译间隙与参会者就当前问题进行及时沟通。例如,当译员发现无法听清源语,或译语清晰度和流畅度在传输中受损时,应及时停止翻译,并向听众确认声音是否清流畅。在信号恢复后,译员还应及时向参会者解释,避免他们因不必要的误会对口译质量和效果,甚至译员专业性产生怀疑。

第三,视频会议结束后,译员可通过与客户或雇佣方的简单交流获取用户反馈,为下一次视频会议口译做准备。获取反馈时,译员可重点关注用户对译语音量,翻译质量,视频口译效果和会议过程的满意度,并询问对方的建议和意见。

#### 2. 重视视频口译教学

新冠肺炎疫情促进视频会议广泛使用,视频产业也将在未来取得更大发展(Adam, 2021)。然而,视频口译作为一种特殊的口译形式尚未在口译教学

与培训中获得足够重视。因此,我们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第一,提升译员话轮管理能力。译员应充分意识到对视频会议口译进行话轮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具备一定能动性采取实际行动。例如,当发言人发言时间过长时,译员应适时介入,以避免源语信息过载;当发言人话轮重叠时,译员也应通过适时介入分配话轮,以避免声音重叠甚至交际秩序混乱;当译员与发言人话轮重叠时,译员应及时停止翻译,同时倾听发言人发言,再在后续翻译中补充信息。

第二,提升译员非言语交际模态捕捉与调用能力。前人研究表明,注视对促进交际者间相互理解具有重要作用(Mason, 2012),还能展现说话人的注意力方向(Lang, 1978)及说话人间的同盟关系(Llewellyn-Jones and Lee, 2013)。本研究的发现证实上述观点,并进一步发现,当交际者处于不同物理空间时(如译员与线上参会者),注视还有助于锁定并保持对方的注意力。因此,相比于面对面会议口译员,视频会议口译员或可尝试一定程度上使用注视或手势模态与线上参会者进行多模态交际,以实现交际目的,如示意话轮转化,引起和保持参会者对译语的注意力,鼓励参与交际等,以保证口译交际过程顺利。

## 七、小结

本文借助新兴的译员“角色空间”理论,采取多模态话语分析法对视频会议口场景下汉英双向口译译员角色展开分析,发现:(1)视频会议口译员角色既有与传统面对面口译员角色相似的多样性,又具有自身特性,即空间维度上的复合性。在线上参会者面前,译员主要是信息转化与传达者,而在线下参会者面前,译员还同时是意识形态同盟者。两个角色空间彼此独立又同时共存,对日后译员交际管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2)译员角色空间以言语加非言语的多模态方式构建而成,且译员对多模态交际方式的选择既由交际需求决定,又可能受到与主要参会者时空差异的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最后建议在译前、译中和译后三个阶段开展客户教育,并从话语管理策

略与技巧和非言语交际模态捕捉与调用能力两方面增强视频会议口译员培训。

本研究从时空维度解构译员角色特性,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视频会议口译这一特殊口译形式的认知,洞悉技术对人类交际活动的影响,同时总结经验,为保证视频会议口译顺利提供指导意见。由于可获得语料数量有限,本文暂就三个视频会议录像进行分析。未来随着视频会议口译实践的广泛铺开,我们还将提升数据的丰富性与完整性,建立多模态语料库,提升研究结论普遍性,并扩展研究主题多样性。

### 参考文献

- [ 1 ] Adam C. COVID-19 and the New Era of Online Video Conferencing [ EB/OL ]. [ 2022-02-20 ]. <https://www.ravepubs.com/covid-19-and-the-new-era-of-online-video-conferencing/>.
- [ 2 ] Bao-Rozée J. Using Multimodal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the Interpreter [ D ]. School of Arts and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Stirling, UK, 2016.
- [ 3 ] Braun S, Taylor J L. Video-mediated interpreting: An overview of current practice and research [ M ] // S. Braun & J. L. Taylor (Eds. ), Videoconference and remote interpreting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UK: Intersentia Publishing Ltd, 2012: 145-185.
- [ 4 ] Bühler H. Linguistic (semantic) and extra-linguistic (pragmatic) criteria for the evaluation of conference interpretation and interpreters [ J ]. Multilingual, 1986, 5 (4): 231-235.
- [ 5 ] Devaux J. Technologies in interpreter-mediated criminal court hearings an actor-network theory account of the interpreter's perception of her role-space [ D ]. Salford: University of Salford, 2017.
- [ 6 ] Devaux J. Technologies and role-space: How videoconference interpreting affects the court interpreter's perception of her role [ M ] // Fantinuoli C (eds. ). Interpreting and technology. Berlin: Language Science Press, 2018: 91-118.
- [ 7 ] Goodwin C. Conversational Organization: Interaction between Speakers and Hearers [ M ].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 [ 8 ] Lang R. Behavioral aspects of liaison interpreters in Papua New Guinea: 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 M ] // D. Gerver and H. Wallace Sinaiko, eds.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Plenum, 1978: 231-244.
- [ 9 ] Licoppe C, Verdier M, Veyrier C. Voice, Power, and Turn-Taking in Multilingual, Consecutively Interpreted Courtroom Proceedings with Video Links [ M ] // Napier J, Skinner R, Braun S. Here or There: Research in Interpreting via Video Link. Washington: Gallaudet University Press, 2018: 299-322.
- [ 10 ] Licoppe C, Veyrier C. The interpreters as a sequential coordinator in courtroom interaction. 'Chunking' and the management of turn shifts in extended answers in consecutively interpreted asylum hearings with remote participants [ J ]. Interpreting, 2020, 22 (1): 56-86.
- [ 11 ] Llewellynjones P, Lee R G. Getting to the Core of Role: Defining Interpreters' Role Space [ J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preter education, 2013.
- [ 12 ] Llewellynjones P. Redefining the Role of the Community Interpreter: The Concept of Role-space [ J ]. Continuum Intl Publishing Group, 2014.
- [ 13 ] Norris S. Analyzing Multimodal Interaction: A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 M ]. Routledge, 2004.
- [ 14 ] Mason I. Gaze, positioning and identity in interpreter-mediated dialogues [ M ] // Baraldi C, Gavioli L (eds. ). Coordinating Participation in Dialogue Interpreting.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12: 177-



- 200.
- [ 15 ] Mellinger D, Hanson T A. Interpreter traits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echnology and visibility [ J ].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2018 ( 3 ): 366–392.
- [ 16 ] Mikkelsen H, Llewellyn-Jones P, Lee R G. Redefining the role of the community interpreter: The concept of "role-space" [ J ]. *Interpreting*, 2015 ( 2 ): 158–162.
- [ 17 ] Moser-Mercer B. Remote interpreting: issues of multi-sensory integration in a multilingual task [ J ]. *Meta*, 2005 ( 2 ): 727–738.
- [ 18 ] Napier J, Skinner R, Turner G. Enabli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rough Video Remote Interpreting: A Case Study [ M ] // Napier J, Skinner R, Braun S. ( eds. ) *Here or there, research on interpreting via video link*. Washington: Gallaudet University Press, 2018: 230–263.
- [ 19 ] Norris S. Some thoughts on person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a multimodal perspective [ M ] // Bhatia V K, Flowerdew J, Jones R H ( eds. ) . *Advances in Discourse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08: 132–148.
- [ 20 ] Pochhacker F. Moving boundaries in interpreting [ M ] // Dam H, Brogger M N, Zethsen K K. ( eds. ) . *Moving Boundar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19: 45–63.
- [ 21 ] Pochhacker F. "Going Video": Mediality and multimodality in interpreting [ M ] // Salaets H, Brone G. ( eds. ) . *Linking up with Video, Perspectives on interpreting practice and research*.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20: 13–46.
- [ 22 ] Skinner R, Napier J, Braun S. Interpreting via Video Link: Mapping of the field [ M ] // Napier J, Skinner R, Braun S. ( eds. ) . *Here or there, research on interpreting via video link*. Washington: Gallaudet University Press, 2011: 11–35.
- [ 23 ] Sun T. Interpreters' mediation of government press conference in China: Participation Framework, Footing and Face-work [ D ]. School of Languages, Linguistic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UK, 2011.
- [ 24 ] Vranjes J, Brone G. Eye-tracking in interpreter-mediated talk: From research to practice [ M ] // Salaets H, Brone G. ( eds. ) . *Linking up with Video, Perspectives on interpreting practice and research*.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3–234.
- [ 25 ] 范志嘉. 用户教育: 口译质量评估的隐性参数 [ J ].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8, 41 ( 1 ): 150–158.
- [ 26 ] 顾曰国. 多媒体、多模态学习剖析 [ J ]. *外语电化教学*, 2007 ( 2 ): 3–12.
- [ 27 ] 胡娟. 译员自我的维度突破——《社区口译员角色再定位: 角色空间》评介 [ J ]. *中国翻译*, 2016, 37 ( 1 ): 66–69.
- [ 28 ] 蒋莉华, 李颖. 多模态视角下的远程视频会议口译: 基于医疗平台视频线上会议的案例分析 [ J ]. *中国翻译*, 2020, 41 ( 5 ): 163–170.
- [ 29 ] 刘虹. 话轮、非话轮和半话轮的区分 [ J ].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2 ( 3 ): 17–24+80.
- [ 30 ] 王斌华. 疫情之下的英国利兹大学远程翻译教学管理 [ J ]. *中国翻译*, 2020, 41 ( 6 ): 75–76.
- [ 31 ] 王立非, 文艳. 应用语言学研究的多模态分析方法 [ J ]. *外语电化教学*, 2008 ( 3 ): 8–12.
- [ 32 ] 王炎强. 口译“居间者”的角色认知 [ J ]. *上海翻译*, 2017 ( 1 ): 90–93+95.
- [ 33 ] 姚斌. 远程会议口译: 回顾与前瞻 [ J ]. *上海翻译*, 2011 ( 1 ): 32–37.
- [ 34 ] 张爱玲, 丁宁. 抗疫背景下的远程专业口译教学 [ J ]. *中国翻译*, 2021, 42 ( 1 ): 81–88.
- [ 35 ] 詹成. 政治场域中口译员的调控角色: 基于语料库的译语偏移研究 [ M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

## A Multimodal Study on Interpreters' Role in Video Conference Setting

Pan Menglai

*Guangxi International Business Vocational College, Nanning*

**Abstract:**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at the end of 2019 has spurred the volume of video conference interpretation services. However, what has not been clear is what role interpreters play in this special situation of communication. The paper adopts “Role-space” theory as the analysis framework, and uses multimodal analysis software ELAN to carry out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on the role of video conference interpreters. It is found that videoconference interpreters not only share the varieties with interpreters working in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situation, but also has their own specialties as they play dual-role in spatial sense. Moreover, the “role space” is constructed in multi-modal, instead of single-modal manner. Based on this, it is suggested to strengthen user education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videoconference, and interpreting training should highlight the significance of turn management and the use of multi modes in video-mediated interpreting.

**Key words:**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Video conference; Video-mediated interpreting; Interpreters' role